“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何以形成 ——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

田海平¹, 郭友兵²

(1.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 北京, 100875;

2.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1)

摘要:辩证法只有经历真实的“历险”,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拯救。从观念史视角对“辩证法的历险”进行清理,是理解“辩证法何以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问题的关键。黑格尔辩证法在观念思辨层面展开了原则体系(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历史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和总体的原则),在观念史上留下了一座丰富的宝藏。黑格尔之后,辩证法在观念史层面上面临着如何处理、承接、消化、扬弃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问题。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者”“颠倒者”“继承者”,提出了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继承发展和辩证利用,具体体现在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主体的重审”“主题的重新界定”。这一思想在观念形态上已然属于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的展开中,隐含着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当代思想主题,即辩证法诸种历险之展开。后形而上学思想是从形而上学“同一性理念”的对立面,特别是被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排斥的“生命”“语言”“欲望”“理解”“现象”“行动”“他性(他者)”“伦理”等出发,使辩证法真实地面对人的具体感性生命,面对人的生产劳动实践,面对人的“非理性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的自我展开。让辩证法奠基于“生命的人”“说话的人”“欲望的人”“理解中的人”“现象中的人”“行动中的人”“自我享用的人”“伦理的人”,是“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进路。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形而上学)的解体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思想任务的提出,构成了在观念史层面“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重要思想机缘——可称之为“哲学的第二个开端”。

关键词:黑格尔; 马克思; 辩证法; 后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1-0001-13

“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出自古希腊语 $\delta\upsilon\alpha\lambda\epsilon\chi\epsilon\iota\upsilon\varsigma\ \tau\acute{\epsilon}\chi\eta\eta$ 。它的原意与人类使用语言的技艺紧密相关。这个概念在今日汉语哲学中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西方哲学术语。然而,“熟知非真知”这句话,对于辩证法同样适用。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即使在黑格尔之后,“辩证法”也并未彻底摆脱被误解甚至被曲解的命运。实际上,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或西方思想中,就“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及其“珍宝”而言,一直遭遇了一种需要“拯救”的思想境遇,并在这一意义上面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思想任务。事实上,辩证法只有经历真实的“尘世历险”,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拯救”。也就是说,辩证法不能只出现在抽象逻辑、概念、话语和思维形式之中,就其所具有的“革命性”“批判性”“实践性”而言,“人们将会在事实中看到辩证法的出现”^{[1](6)}。

收稿日期: 2024-09-28; 修回日期: 2024-11-23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18ZDL14);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马克思对黑格尔自由观的继承与超越研究”(22FZX005)

作者简介: 田海平,男,湖北天门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邮箱: thp@bnu.edu.cn; 郭友兵,男,四川广元人,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莫里斯·梅洛-庞蒂以“辩证法的历险”这一短语作为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的书名^{①[1](7)},并试图以此回应当时法国哲学家萨特提出的“为共产主义政治进行辩护”的思想任务。其内含的“思想机缘”亦被梅洛-庞蒂概括为:“实在和价值、主体和客体、评判和纪律、个体和整体、现在和将来不是陷入冲突,而是应该逐渐进入契合的那一崇高时刻。”^{[1](6)}因此,从观念史视角对“辩证法的历险”进行清理,是理解“辩证法何以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与梅洛-庞蒂从马克斯·韦伯问题(“知性危机”)进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史清理不同,本文试图从更大的观念史视角清理辩证法的“历险”,即从三个方面对辩证法的“革命性”做进一步澄清:(1)如何看待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2)如何回应马克思提出的“拯救辩证法”的任务?(3)如何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在后形而上学层面对辩证法的“拯救”?

一、黑格尔的遗产:辩证法诸种原则之确立

历史地看,辩证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那里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贯穿于其中的一些相近或类似的精神和旨趣。就一般意义而言,辩证法存在两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在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是指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或发生、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认识论意义上是指揭示和把握真理的有效思维方式、方法。大家现在所谈的辩证法,通常是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阐释发扬之后的辩证法。黑格尔是理解辩证法的关键,他是近代以来把辩证法发展到高峰的第一人。如果没有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深入阐释和发扬,就可能没有当代辩证法。辩证法是黑格尔终结近代形而上学主客分裂、瓦解以主观性为最高原则的意识哲学、重建主客统一性的根本方法,也是贯穿于其一切哲学活动和所有著作的基本方法,兼具存在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内涵,本身具有较为复杂的内容和结构。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既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也是我们把握真理的方法;既具有正、反、合的形式,也具有螺旋式上升的结构等。经过黑格尔的重视和阐释,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范畴、术语、规定等都被确定下来,这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论的重大贡献及给后来人的辩证法“历险”留下的重要遗产。

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无疑是多方面的,且每一个方面的内涵都异常丰富。然而,就其主旨而言,这里要重点予以澄清的,是其在观念思辨层面针对“知性观念的虚假谨慎”和“理性观念的充分自信”而展开的那些作为面向现实性、实践性和人类行动的观念论方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下文将重点讨论其中主要的五个原则。

(一) 矛盾的原则

矛盾的原则构成了黑格尔“思辨认识”的观念论的核心。这一观念是认识的基础与起点,并贯穿认知过程之始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矛盾”与“辩证法”“对立统一”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矛盾”作为“辩证法”构成了黑格尔“概念思辨”的第二环节或核心环节。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与“矛盾”具有十分相近的含义。贺麟在《小逻辑》中不时将 *Dialektik* 译为“辩证进展”或“矛盾发展”,又称之为“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由此可以推测二者在黑格尔哲学中具有相同的内涵而可以互换使用^②。黑格尔指出,“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2](259)},”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因此,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2](177-178)}。由此可见,承认并肯定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中存在“辩证法”或“矛盾原则”,是构成科学认识观念论的前提和基础。

“矛盾的原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清单中居于首要位置。因为黑格尔,人们不再将“矛盾”的观念与一种消极的、悖谬的观念相等同,而是与事物发展的动力、实质相联系。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又被称作“对立统一”。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3](556)}毛泽东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4](299)}同样,“矛盾原则”构成“唯物辩证法”的基础或根本原则。总之,承认和肯定事物的矛盾性是构成“概念思辨法”与“唯物辩证法”的共同的基础。在对待“矛盾”的态度上,黑格尔不像“怀疑主义”那样由于“出现矛盾”便认为事物“不可知”,进而否定真理的可能性,而是在“矛盾”中力求“肯定性的东西”,并进展到“发展的原则”,“矛盾的原则”由此成为“概念思辨法”的起点。同时,《小逻辑》中的范畴演绎过程显示,“矛盾的原则”构成任何一个范畴的本性,并贯穿从“存在”到“理念”的发展过程之始终。

(二) 发展的原则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事物存在的本性或起点是“矛盾”,而其理想或归宿则是作为真理与自由的“概念”。矛盾引起事物的运动,运动的形式被黑格尔规定为“发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指出,要得到真理或“概念”的知识,“我们必须进入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异常概括和枯燥的:这就是‘发展’和‘具体’两个原则”^{[5](26)}。他进而指出“发展”的两种含义:“第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潜能、潜力或我所谓的‘潜在’。发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在自为’,亦即真在或‘实在’。”^{[5](27)}概言之,自我矛盾着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潜在”到“现实”的“自在自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精神现象学》中被规定为“实体即主体”的过程,同时是一个“自我矛盾”“自我运动”“自我否定”“自我中介”“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自在自为”的过程。不仅“哲学史”与“精神现象”的进展是“发展”,而且“思维”“意志”“理性”分别在《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中的自我实现形式也是“发展”。发展的自我中介形式是“扬弃”,一方面具有自我保持的“自身同一性”,另一方面具有自我否定的“革命进步性”。就前一方面而言,黑格尔指出:“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变化的过程里,它仍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5](28)}如其所言,“逻辑学”中思维的各范畴都是“概念”的内在环节,“现象学”中意识的各形态都是“精神”的具体现象,其他著作中各主体的发展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各言说主体在发展或具体展开过程中都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就后一方面而言,发展同时是一种“质的飞跃”或“进步”“进化”“完善”,发展而来的后一环节具有前一环节所不具有的内涵而更加具体。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4](283)}同时,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描述的思维由“存在”到“概念”的自我发展构成了“发展”本身的范型。

(三) 具体的原则

无条件的矛盾是事物的内在本性,基于矛盾的发展是事物的存在方式,通过“矛盾”“发展”,事物的“普遍性格”便被规定了。进而,“具体”构成“矛盾发展”在逻辑上的原则。作为“矛盾发展”的结果,“具体”主要指不同(包括相反甚至对立)规定性的统一。同时,需要注意其两方面的内涵。其一,黑格尔所谓的具体是区别于“感性之具体”的“思想之具体”。“感性意识通常被认作最具体的,因而同时也常被看成是最丰富的。但这仅就其材料而言,倘若就它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来看,其实可以说是最贫乏的和最抽象的”^{[2](189)}。“概念是具体的,概念自身,甚至每一个规定性,本质上一般都是许多不同规定的统一体”^{[2](102-103)}。实质上,“具体”是由“表象”进展到“概念”之扬弃“感性意识”的思维或哲学活动的结果。其二,黑格尔所谓的具体是区别于“理智”之“抽象”的“理念”或“理

性”之“具体”。“哲学属于思想的领域，因而从事研究的是共性，它的内容是抽象的，但只是就形式、就表面说才是如此，而理念自身本质上是具体的，是不同的规定之统一。……理智的反省才是抽象的理论，不是真的，只是在头脑里是正确的，而且没有实践性。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回复到具体。”^{[5](31)}实质上，“具体”本身是多种不同“理智规定性”的统一。同时，黑格尔指出真实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东西。“无论什么可以说得上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东西，因而包含差别和对立于自己本身内的东西。”^{[2](259)}因此，“概念思辨”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从感性的规定性到理智的规定性、从较少的规定性到较多的规定性、从片面到全面、从部分到全体以及对立面的统一、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等从“抽象”到“具体”对“存在”的认识过程。这一方法被马克思在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加以运用并形象地说明：

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6](700)}

也就是说，对于具体对象的认识，总是先从感性的“表象”获得抽象的“规定”，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而获得更多的“规定性”，最后实现多种规定性之“综合”或“统一”的“具体”的再现，由此把握对象的丰富内涵及本质。因此，思辨认识是一个“圆圈”式的不断返回认识对象力求获得全部规定性的认识过程，同时每一次返回都是一次向内深入而使认识更加“全面”和“具体”的过程。在《小逻辑》中，这种“全面”或“具体”的实现就是“概念”或“理念”。同时，黑格尔的每一本著作及演讲的叙述都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四) 历史的原则

“历史”是“矛盾发展”在时间上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的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做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6](12-13)}正如恩格斯所言，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及演讲中贯穿着一种自始至终的“历史感”。从本质上讲，这种“历史感”或“历史观”是“矛盾发展”在时间中的必然现象，因而事物存在本身以及对事物的认识都相应地体现出“流动性”“变迁性”“过程性”“阶段性”以及“从低级到高级”“上升”“超越”“进步”“进化”等历史性原则。虽然《小逻辑》是纯粹逻辑的著作，但是思维由“存在论”经“本质论”到“概念论”的进程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的”。

(五) 总体的原则

总体原则是以上四大原则综合统一的结果。通过“矛盾”“发展”及“具体”“历史”的原则，认识对象呈现为一个类似“生命”或“有机体”的总体。这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开篇批判“无概念”或“知性”的认识方式所描述的：“这种人不那么把不同的哲学体系理解为真理的前进发展，而毋宁在不同的体系中只看见了矛盾。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

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仅彼此不同,而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7](2)}因此,关于对象的认识或真理相应地体现为不同过程、不同环节、不同规定性相统一的总体或“全体”。“真理是全体。但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7](13)}在黑格尔哲学中,真理就结果而言是“概念”“理念”“精神”的总体,就内涵而言是思维与存在、逻辑与经验相统一的总体,就方法而言是经验论与唯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总体,等等。从存在论上讲,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总体”,或者说,唯有“总体”才是“事情本身”,因此,脱离“总体”的认识是构成“躲避事情自身的一种巧计”^{[7](2-3)},真理的认识需要“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4](317)}。也就是说,对真理的认识需要遵循总体的原则以避免相反的谬误。诚如列宁所言:“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3](560)}总之,黑格尔始终反对“知性”逻辑的片面认识而坚持“思辨”逻辑的“总体”原则。这一“总体”在《小逻辑》中就是包括“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之思维发展的全部过程及环节。

“矛盾”“发展”“具体”“历史”“总体”经过黑格尔的阐释被赋予了重要的辩证法内涵,黑格尔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五个原则在黑格尔的“概念思辨法”中呈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矛盾”“发展”“具体”“历史”“总体”等原则的概括说明仍然是非常抽象和机械的。同时,如果脱离实践与认识对象的“具体运用”,这些原则就会成为单纯的教条。但是,人是思维的存在物,唯有摆脱思想上的“黑暗”与“恐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需要以真理和自由为目的的“‘概念’地思考”,而以上原则仍然构成“‘概念’地思考”所需参考的一般准则。

二、拯救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遗产的继承和利用

黑格尔辩证法在观念思辨层面展开的原则体系(特别是上述“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历史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和“总体的原则”),无疑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抹杀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对辩证法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然而,由于一直以来辩证法服从于(和服务于)西方形而上学体系构造且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点,因此,黑格尔之后的辩证法的观念史,面临如何处理、承接、消化、扬弃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问题。马克思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学生”“批判者”“颠倒者”,在处理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过程中,提出了“拯救辩证法”的任务: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遇到了“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马克思对之批判改造形成的“唯物辩证法”,是一个“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恩格斯明确指出: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法在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6](1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赞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并特别强调其“伟大之处”^{[8](98)}。他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

中自述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得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9](22)}

虽然马克思的辩证法源于黑格尔,但是马克思不满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遗产进行“扬弃”“改造”的结果。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满集中体现在这样一段话中:“……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9](2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形成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独立部分。30年后,马克思指出自己创作《资本论》采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方法,即批判、扬弃黑格尔辩证法形成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满明确表达为两点: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神秘”的方面,二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因此,“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将“倒立着的”辩证法重新“倒过来”,即把在黑格尔那里被室息的辩证法的批判性、革命性和生命活力拯救出来,使其真实地进入现实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从黑格尔那里“拯救辩证法”的任务:“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10](288)}

我们知道,由于多种原因,马克思写作《辩证法》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其辩证法的历险,则现实地存在于《资本论》等著作的创作过程中。这恰恰是以一种现实形态的“历险”的方式,为后世哲学示范了“拯救辩证法”的道路。由此,马克思明确宣布: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22)}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性质被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室息了,这可以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结构看出来。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明确指出:“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2](172)}“抽象”“辩证”“思辨”构成了黑格尔逻辑的三个环节,黑格尔将思辨环节视为前两个环节的统一,规定为真理之寓所。马克思则强调辩证法“辩证”或“否定”的环节,指出黑格尔重视“思辨”环节这一逻辑,具有虚假神秘的性质:

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8](94)}

通过思辨逻辑,黑格尔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把人类的历史变成抽象的东西的历史,根据其先验的逻辑标准处理一切对象,“思辨”成为“辩证”的反面。因此,马克思是反对“思辨”的肯定而主张“辩证”的否定的。黑格尔把辩证法作为逻辑学的一个环节,而马克思则把辩证法当作逻辑本身。在这一区别之下,马克思的方法可以被称作辩证法,黑格尔的方法准确来讲只能叫作“思辨法”,因此将二者笼统地称为辩证法是有较大问题的。因为黑格尔将其逻辑真理最终归结为“思

辨”并运用于一切对象, 所以其哲学成为最大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 本身具有泛理性、泛逻辑主义的神秘性质。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与主要在于解释世界的黑格尔哲学不同, 马克思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和强烈的改造世界的诉求。在这样的哲学视野下, 马克思提出了“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任务: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 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 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 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9](22)}

我的辩证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 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 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过程, 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 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9](22)}

黑格尔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 辩证法作为逻辑学的一个环节, 在形而上学体系的构筑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黑格尔那里, 辩证法、逻辑学、形而上学是统一在一起的, 辩证法服务于逻辑学大厦的构造和形而上学王国的建筑。因此, 在具有泛逻辑主义、泛理性主义的黑格尔逻辑学、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中, 辩证法的批判光辉被遮蔽了、创造本性被窒息了, 辩证法成了黑格尔思辨哲学金字塔中的木乃伊。最终, 辩证法在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中异化了, 作为最能揭示和把握生命方式、存在结构的方法, 也变得敌视人、敌视生命了。马克思不满于黑格尔思辨哲学囚禁了辩证法的生命, 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解剖、批判, 旨在打碎其形而上学的桎梏、解除其泛逻辑主义的紧箍咒、炸毁其意识形态的幻想。通过唯物史观、实践哲学等的创立, 马克思实现了对“头脚倒置”的黑格尔哲学的再一次颠倒, 即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批判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通过“颠倒”, 马克思“拯救”了被黑格尔哲学囚禁的辩证法: 破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 保留并利用其合理内核作为展开实践批判的方法; 解放了其批判性、创造性和革命性, 使辩证法真正发挥了解释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继承发展和辩证利用, 具体体现在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辩证法主体的重审和辩证法主题的重新界定。

(一) 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

马克思辩证法关注的论域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通过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服务于绝对精神及其展开的逻辑理念世界的辩证法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颠倒”, 使之进入现实生活世界的“历险”。马克思对“辩证法论域”的拓展, 其根本旨趣在于其深刻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这一点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及其展开的逻辑理念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黑格尔看来, 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和终极目的, 它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不断地推动着世界历史发展, 而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世界则只是绝对精神展开过程中的环节或表现。因此, 黑格尔哲学在方法论上采用的是一种先验的、超验的、逻辑推演的方式, 试图通过概念之间的辩证运动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 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终极目的, 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世界的重要性, 导致其在解释现实世界时显得苍白无力, 无法真正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其二, 黑格尔哲学在方法论上过于强调逻辑推演和概念运动, 忽视了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 使其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上显得力不从心, 无法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有效指导。马克思辩证法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的,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体现,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不断变化, 而不是某种先验的、超验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 辩证法在马克思论域中, 不再是抽象的观念世界或思辨世界中的概念逻辑运动, 而是在事物、现实、感性和实践中现实展现。它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 深入探究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 为人

类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马克思辩证法通过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彻底摒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及其展开的逻辑理念世界。这一论域的拓展,不仅使得马克思辩证法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也使得马克思辩证法在解释现实世界和指导人类实践活动上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开辟了一条在人的现实世界和实践活动的“尘世历险”中“拯救辩证法”的道路。

(二) 对“辩证法主体”的重构

马克思的辩证法主体是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概念、理念、精神的抽象主体^[11]。因此,马克思辩证法论域中的“拯救辩证法”首先意味着对辩证法的“实在主体”的重申。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中,实在主体往往被抽象为概念、理念、精神等超验的、非现实的存在。这些主体虽然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却缺乏具体性和现实性,难以真正触及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相反,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才是辩证法的真正的“实在主体”。他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和创造着世界,同时也受到世界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人”,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他们具有自己的实践活动、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所谓的“人类社会”,则是由这些现实的人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它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发展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辩证法的核心研究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而实践活动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实践活动,人们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不断地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生存环境。这种实践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特点,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指出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活动的同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追求,认为人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追求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这使得马克思辩证法在指导人类实践活动时更具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辩证法主体的这一“转向”,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哲学主体的重新定位,也深刻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改造。在马克思辩证法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和支持。

(三) 对“辩证法主题”的重新界定

当我们在辩证法论域中深入探讨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两位哲学巨匠的思想时,不难发现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现代性问题,虽然面对同一难题,但是他们各自采取的应对方法和路径却截然不同。黑格尔坚持在思想中解决,因而把问题变成了思辨哲学的“原则体系”的思辨逻辑推论;相反,马克思则要求在现实中解决,因而把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①[12]}。19世纪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文化形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科技进步,但同时也孕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社会中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疏离、人与社会的分裂等矛盾,根源都在于人类理性本身。因此,黑格尔试图构建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通过揭示理性的本质和规律,进而解决现代性问题。换言之,黑格尔将现代性问题视为一个哲学问题,试图通过哲学思考来找到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钥匙。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则主张回到现实之中来解决现代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阶级冲突以及人的异化等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解决现代性问题,就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结构入手。只有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才能打破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新社会,即一个人们可以摆脱资本的束缚和压迫、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

通过对辩证法论域中“现代性问题”这一主题的重新界定,辩证法在马克思手中迸发出应有的批判性、革命性,从而使马克思思想能够在承接和辩证摒弃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体系的基础上,在论域的拓展、主体的重构和主题的重新界定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真正发挥了马克思辩证法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三、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任务:辩证法诸种历险之展开

辩证法摆脱形而上学思想谱系及其现实运作,是辩证法告别神秘形式、走向现实合理性的“历险”。马克思辩证法以扬弃和处置黑格尔辩证法遗产的方式,在辩证法观念史上确立了最具当代性的、批判的、革命的“论域拓展”“主体重构”和“主题界定”。马克思因此使得辩证法走上了一条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并从形而上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道路。“回归尘世历险”的辩证法划出了当代思想的边界,它表明在黑格尔之后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

辩证法的“历险”首先是说,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终结之后,辩证法不再诉诸僵死的“概念逻辑”的抽象运动,它并不旨在预设某种超感性绝对和超历史永恒的被规定的现存之物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据,也不是旨在服务于或服从于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构造或绝对权威。辩证法的本性,日益彰显为一个从矛盾的原则(对立统一原则)、历史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和总体的原则来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因此,马克思“拯救辩证法”代表了后形而上学时代思想的一次“伟大历险”。这是一个被莫里斯·梅洛-庞蒂称为“辩证法的历险”的哲学观念变革。

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指认它呈现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特质的时候,并不是主张将《资本论》中所示范的辩证方法或辩证法理论视为某种现存完备的“绝对体系”或“唯一真理”;相反,后形而上学思想所要求的是一种能够透过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及其现实运作,透过一切先验预制的或者权力控制的形式,直面问题本身的思维类型和实践类型。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和利用,在观念形态上已然属于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其典型特征可以表述为,“它时刻提醒人们:在形而上学的哲学终结之后,我们必须学会,避免让我们的思想或时代滑入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或者现实运作的神秘形式之中。”^[13]

因此,在“后形而上学思想”语境下,“辩证法的历险”不可能止步于一种形式,或者只尊奉一种形式的辩证方法(或辩证法理论)为绝对权威;而应当是在“辩证法的诸种历险”中展开“辩证法的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历险”本身就呈现为多种形式或多种视角。其中,作为“辩证法的新形式”的重要内容,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地予以关注:一是政治方面,即“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和“德国的工人运动”的政治实践——以赛亚·柏林评论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实际地“发挥作用的辩证法”^{[14](254)},恩格斯则指认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辩证法的继承人”。这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和人类解放的“政治维度”,使辩证法成为“革命辩证法”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展现。二是经济方面,《资本论》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一个伟大发现,是使辩证法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展现。

基于上述观念史视域的梳理,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哲学观念变革的理解性视域来说,特别是对马克思辩证法“为何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问题的回应方式而言,无论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近黑格尔解释”,还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解释”,虽然在区别于“对马克思哲学近代化的倒退式解释”方

面有积极意义,但其实他们都没有正视马克思在“拯救辩证法”的工作中所展开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当代性。从这个视角来看,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历史与逻辑中,隐含着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当代思想主题,即辩证法诸种历险之展开。我们唯有借助这个视角,透过拯救辩证法的“历史前提”和“基本原则”,才能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下展开的“辩证法的历险”。

(一) 拯救辩证法的历史前提:观念史层面展开“辩证法诸历险”的思想机缘

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总是属于某种类型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它总是与形而上学深度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后形而上学思想则意味着哲学的新开端,它明确地要将二者加以区分,且由此开启了拒斥形而上学或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这是辩证法诸种历险的一个总体形态表征。我们知道,辩证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形而上学追求的“最高智慧”,它是“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④[15](68)}的最高智慧形态。因为柏拉图确立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方式是由辩证法“正名”的,所以一直到黑格尔,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辩证法都属于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当代西方思想甚至把形而上学等同于柏拉图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在形而上学框架下面临亟待拯救的观念史境遇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服从于抽象化、表象化的概念思维,因而总是在“天人相分”“主客二分”“思维与存在对峙”的主体形而上学框架下将辩证法演变成了“抽象概念的自我游戏”;另一方面,是由于它脱离生活、遗忘生活并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最终导致了“与辩证法本性的背道而驰”。虽然黑格尔确立的辩证法的原则体系将这种“抽象概念的自我游戏”发展到了顶点,但是也正是黑格尔的遗产证实了:辩证法的历史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史的组成部分,只服务于“死的逻辑”,而不是面向“活的智慧”。这是马克思指认辩证法陷入困境、亟待被拯救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语境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尔绝对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的解体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思想任务的提出,构成了观念史层面“辩证法诸历险”得以展开的重要思想机缘——可称之为“哲学的第二个开端”,即相对于由古希腊人命名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哲学”或“哲学形而上学”)而言,由马克思和当代西方哲学所开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意味着哲学的新开端。

(二) 拯救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运用“后形而上学思想”拯救“同一性”

当代西方思想,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当且仅当从其经历的诸种“辩证法历险”的观念论层面看,可解读为与马克思“同时代”且面临相同的思想机缘——他们共同面对如何在后形而上学思想框架下拯救辩证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尔的遗产和马克思“拯救辩证法”的思想任务,既是历史地又是逻辑地复现于当代西方哲学所经历的“辩证法诸历险”中。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神秘形式中“拯救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它是一个新的漫长旅程的“开端”,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思想谱系”(“清理传统”)及其“现实的运作”(“面对现实”)中“拯救”辩证法。在这个可称之为“哲学的第二开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上,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辩证法的原则,即贯彻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等思想原则,以拯救被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抽象化了的、绝对化了的“同一性”。

在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框架下,辩证法无法解决它对“同一性”妥协的问题^[16],且使“同一性”成为一种“哲学魔法”。因此,拯救辩证法必然是在避免使“同一性”成为“绝对”的诸种努力中拯救“同一性”。这意味着,后形而上学思想是从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理念”的对立面,特别是被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排斥的“生命”“语言”“欲望”“理解”“现象”“行动”“伦理”等出发,使辩证法真实地面对人的具体感性生命活动,面对人的生产劳动实践,面对人的“非理性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行动”的自我展开及其话语生产。也就是说,“同一性”的现实基础,应该奠基于“生命的人”“说话的人”“欲望的人”“理解的人”“现象的人”“行动的人”“自我技术的人”等。

一是“生命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在黑格尔那里,敌视或瓦解生命的绝对、概念、

理念, 禁锢了辩证法生命。“辩证法的极度痛苦是上升为概念世界的痛苦。”^{[17](4)}叔本华由“意志—表象”的对立统一展开了生命辩证法的主题, 柏格森透过“生命绵延”的辩证运动, 尼采通过“强力意志”的自我肯定, 使“生命的辩证法”成为后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最具直观性和最有冲击力的“辩证法的历险”: 通过生命(否定、绵延、肯定)的辩证运动拯救“同一性”。

二是“语言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概念、命题不是与感性生命无关的自在之物。任何概念、命题、句子都是现实的要素。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辩证法中, 概念总是被处理成实体。实际上, 概念、命题背后隐含心灵与世界、语言与实在的辩证关系。当代分析哲学从语言分析出发, 罗素、弗雷格、逻辑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以语言“能指—所指”的辩证法祭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由于语言经历了从理想语言到日常语言的转换, 从而使得其中隐蔽的“心灵—世界”(“语言—实在”)的“语言的辩证法”得以彰显。

三是“欲望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瓦解”。不可否认, “概念化”的优势在于, 它使辩证法更适合为某种单一“大尺度”的“圆圈运动”或“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进行辩护。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叙事类型以“超我”“大他者”“大叙事”掩盖了隐匿的欲望类型。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辩证法从欲望、本能、无意识等层面揭示了“自我同一性”的“自我性”秘密, 而拉康的“欲望—大他者”理论则将“欲望的辩证法”运用于瓦解一切“形而上学”及其“镜像化”实存的过程中。

四是“理解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穿越”。当辩证思维的魔法与同一性同谋, 辩证法就蜕变成形而上学的立场、论证、解释、理解和认知。理解我们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经受住形而上学”(伽达默尔)——这也是保罗·利科所强调的“人的自身性问题”的根本所在。“文本—理解”的辩证法, 由此必须扩展到以生命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的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和生命现象的诸实践领域和诸精神科学领域。由此, “理解的辩证法”在哲学解释学的诸种努力中, 提供了一条穿越形而上学“迷宫”并拯救人的“自身同一性”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五是“现象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克服”。阿多尔诺曾经明确指出: “从一种历史的高度, 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7](6)}现象学运动面向自识现象(胡塞尔)、生存现象(海德格尔)、知觉现象的“事情本身”, 可以看作是从现象出发的辩证法展开, 由直观(非概念性)、此在(偶在性)、知觉(特殊性)的视野, 回到形而上学基础并最终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六是“行动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辩证法在形而上学框架下为“知性主宰原则”提供论证, 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最为紧迫(同时也是至为艰难)的思想境遇, 乃在于这种知性主宰原则的全面胜利。因为, 现代性已然将形而上学知性主宰原则现实地实现了出来——它展现为形而上学世界图景的现实运作。因此, 面对“奥斯维辛之后的思想境遇”(阿多尔诺), 面对“艾希曼审判”中“平庸之恶”之诘难(汉娜·阿伦特), 辩证法必须是“行动的”, 才能最终走出知性主宰的困境。作为“行动的辩证法”, 它必须透过“复数性的人们”的共同行动, 由共同感、叙事和范例的有效性确立共同行动的辩证原则。明智的政治判断力只有指向我们的共同行动, 才能完成对形而上学的最后的“终结”。

七是“自我技术的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破除”。后形而上学思想最为棘手的难题是从个体差异性向普遍同一性的过渡。如果辩证法仍然受制于知识、话语、理性、真理和权力的“起源幻相”, 在多元价值时代重建普遍性就必然会重新落入形而上学的“起源幻相”。在这个意义上, 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 马克思关于资本运行规律的研究, 福柯关于“现代性规训体制”的谱系调查等, 都属于破除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起源幻相”的思想努力。在这条道路上, 福柯考察“自我”是

如何被一系列的认识与实践塑造成一种主体,他在“自我技术的伦理学”的名下展开了一条通往“我”的辩证法的道路。

四、结语

在辩证法的诸种历险中,马克思拯救辩证法与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同时代性”,是一个有待系统展开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论题。马克思的辩证法虽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和辩证利用,但不能因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为一种新的“体系辩证法”^[18]。相反,考虑到“颠覆一切形而上学”与“拯救辩证法”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拯救辩证法是从反对或破除一切“体系化”幻相或过度要求出发,来规划辩证法的尘世历险的。在这一点上,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真实旨趣在于:我们不仅要面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更要面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因此,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历险,重申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是以马克思精神穿越整个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及其现实运作并由此穿越整个后形而上学思想迷宫的关键。

注释:

- ① 《辩证法的历险》是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著的一部著名的政治哲学作品,它要清理的问题是:辩证法如何在共产主义政治中成为“革命辩证法”?梅洛-庞蒂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把这一工作描述为:“完成对革命辩证法”的“清理”。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 ② 这里关于“矛盾”与“辩证法”两词同义的推测系根据黑格尔的相关使用做出的,在严格的意义上则需要进一步的词源学考察,此处从略。相关引用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4、119、179页。
- ③ 莫里斯·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还敏锐地指出:“每一种政治行为都介入历史的整体,但这种整体性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种可以信赖的规则,因为它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意见。”因此,在“现实中解决”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克服知性或知性政治家所持意见的片面性,辩证法由此必须在政治问题的层面上应对“现代性难题”。参见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 ④ 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中写道:“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又说:“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参见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81页。

参考文献:

- [1] 梅洛-庞蒂. 辩证法的历险[M]. 杨大春, 张尧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2]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 列宁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4]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一卷[M]. 贺麟,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吴晓明. 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实在主体”[J]. 哲学研究, 2020(8): 11-24, 128.
- [12] 张盾. 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想源头? 从“卢卡奇—科耶夫解读”看[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11-18.

学版), 2007(3): 15–23.

- [13] 田海平, 马英林. 拯救辩证法: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6): 32–35.
- [14] 柏林. 历史唯物主义[C]//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3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254.
- [15] 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M]. 2版. 陈小文,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68.
- [16] 田海平. 从“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 对哲学思维路向之当代性的审查[J]. 学习与探索, 2003(5): 7–11.
- [17] 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18] 鲁克俭. 体系辩证法与马克思新阅读: 一个比较视角的考察[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1): 58–69.

How could “the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dialectics” be formed: Hegel, Marx, and post metaphysical thought

TIAN Haiping¹, GUO Youbing²

(1. Value and Culture Cent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Dialectics can only be truly saved through experiencing a real “adventure”. Clearing up the “adventure of dialec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why dialectics is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Hegel’s dialectical system unfolds its principle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the principle of history, the principle of specific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otality) in the realm of intellectual speculation, leaving behind a rich treasur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Hegel, dialectics fac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handle, inherit, digest, and transcend the legacy of Hegel’s dialectical system at 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x, as a “critic” “inverter” and “inheritor” of Hegel’s dialectical system, proposed “saving dialectics” from the mystical form of Hegelian philosophy at this level. Marx’s saving of dialectics is an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dialectical utilization of Hegel’s dialectical legacy, manifes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domain of dialectics,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theme. This thought belongs to a kind of “post-metaphysical” thought in intellectual form.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unfolding of Hegel, Marx, and post-metaphysical thought contains a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theme that deserves serious consideration, namely, the unfolding of various kinds of “adventures of dialectics”. Post-metaphysical thought starts from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identity concept” of metaphysics, especially the concepts that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excluded by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of being, such as “life” “language” “desire” “understanding” “phenomenon” “action” “otherness (others)”, and “ethics”, to make dialectics authentically face the concrete and sensuous life of human beings in a real way, face human beings’ practice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face the “irrational desire-instinct-unconscious” of self-expression. The various paths that allow dialectics to be based on “people of life” “people of speech” “people of desire”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phenomena” “people in action” “people of self enjoyment” and “people of ethics” are the various paths through which the “adventures of dialectics” can unfold. The disintegration of Hegel’s system of absolute knowledge (metaphysics) and the proposal of Marx’s task of rescuing dialectical thought constitute important intellect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folding of the “dialectical adventures” at the level of conceptual history,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second beginning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Hegel; Marx; dialectics; post metaphysical thought

[编辑: 胡兴华]